

有限性何以成为客观性的条件

——哈拉维情境化知识论的认识论重构

吴心语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6日

摘要

传统科学哲学将客观性奠基于主体的隐身与价值的悬置, 这一理想在历史主义批判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双重追问下陷入困境。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论提出一个反直觉的回应, 有限性不是客观性的障碍, 而是其成立的前提。本文分析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路径的内在困难, 阐释哈拉维如何通过局部视角的优先性、认识客体的能动性与客观性的责任化重铸将有限性转化为客观性的条件, 考察视角、定位与衍射三重机制的运作方式, 并讨论这一方案的理论推进及尚存的实践困难。

关键词

哈拉维, 情境化知识, 客观性, 认识论

How Partiality Becomes a Condition of Objectivity

—The Epistem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Haraway's Theory of Situated Knowledges

Xinyu W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4, 2026; accepted: April 4, 2026; published: April 16, 2026

Abstract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grounds objectivity in the erasur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suspension of values. This ideal has been thrown into crisis under the dual interrogation of historicist critique and feminist epistemology. Haraway's theory of situated knowledges offers a counter-intuitive response:

partiality is not an obstacle to objectivity but 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i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difficulties of both the positivist and the relativist paths, explicates how Haraway recasts partiality as a condition of objectivity through the priority of partial perspective, the agency of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and the reforging of objectivity as accountability, examines the workings of the triple mechanism of perspective, positioning, and diffraction, and discusses both the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the remain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his proposal.

Keywords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Objectivity, Epistem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科学哲学内部围绕客观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刻争论。逻辑实证主义所许诺的那个价值中立、方法透明的认识殿堂，在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学考察面前，逐渐显露出裂痕。科学判断的标准被证明并非天然给定，而是在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惯例中被确立并维持的。客观性问题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它不再仅仅关乎如何排除主体偏好，而是在承认知识生产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之后，追问科学何以仍然可信，以及科学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对自身的后果承担责任。

这场震荡波及的远不止科学哲学的内部版图。几乎同一时期，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也完成了一次方向性的转折。七十年代中后期，一批更具理论自觉的相关研究者将锋芒从科学实践的偏见转向了知识体系的结构本身。她们追问的不再是科学是否足够公正地对待了女性，而是科学赖以自居的客观与中立究竟建立在怎样的前提之上。传统科学所标榜的客观性，被指认为一种以男性经验为默认标准、以特定社会位置为隐含前提的认识框架。这套框架之所以显得普遍，恰恰因为它成功地将自身的特殊性隐匿了起来。由此，客观性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方法论程序一劳永逸解决的技术问题，它变成了一道认识论与政治论交缠的难题。

面对这道难题，女性主义认识论内部分化出了不同的回应路径。经验论试图在既有方法论内部消除偏见，立场论则走得更远，主张从边缘主体的处境出发可以获得更为可靠的认识。两条路径各有其理论代价，前者过于保守，未触动传统认识论的根基，后者则具有将边缘位置本质化，从而固化为新的认识特权的风险。换言之，一个试图用旧工具修补旧框架，另一个在颠覆旧框架时引入了新的独断。客观性概念在这两极之间悬而不决，既无法退回逻辑实证主义许诺的确定性，也不能简单滑向怎么说都行的认知虚无。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僵局中，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88年发表的《情境化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局部视角的特权》显示出独特的理论意义。哈拉维给出的方案颇为反直觉，她并不试图恢复某种更精致的普遍视角，也不等同于宣告客观性已死，而是将客观性重新奠基于认知者的定位之上。所谓情境化，指的是知识必须承认自身的局部性、具身性与有限性。科学认识始终从某个具体的位置出发，经由特定的技术中介与表征方式展开，并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获得承认。只有当这些条件被公开说明而非被遮蔽时，知识才具有被追问和被修正的可能。客观性因此不再等同于主体的消失，而意味着主体对自身位置的承担。这一论断的锋芒所向，是将有限性从客观性的对立面翻转为其成立的条件。

2. 传统科学哲学路径的困境

要理解哈拉维的理论方案为何具有认识论上的必要性，需要先回到它试图回应的那个困局。这个困局并非某一学派的内部争论，而是贯穿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一条结构性裂缝，即客观性究竟能否脱离认知者的具体处境而独立成立。

逻辑实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堪称决绝。该学派将科学的可靠性牢牢锚定在一套方法论规范之上，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它能否通过经验观察加以检验，凡是无法与经验观察发生关联的命题，便被判定为无意义而排除在科学之外。这套标准的实质影响在于，它将心理因素、社会情境、个人信念乃至文化传统等要素一并逐出科学认识的合法范围，科学研究由此呈现出一种近乎真空的状态[1]。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构成了这一主张的基本预设，前者属于客观实在的范畴，后者被拒之门外。与此相应，科学家被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使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不掺杂到研究过程之中，以一种冷静远观的方式揭示自然界的面貌。客观性在这里几乎等同于主体的自我清除，研究者越能够从自身的处境中抽离，所获得的知识就越接近事物的本来样态。这套方案的说服力建立在一个未加审视的前提之上，方法论规范本身可以独立于历史语境而成立。一旦这个前提被撼动，整座大厦便开始松动。可以说，从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认识难以维持完全脱离历史情境与实践共同体的纯粹客观立场。

库恩的范式理论正是在这个缺口处撕开了一道不可缝合的裂口。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仍在规范性层面讨论科学方法不同，库恩转向了对科学史的实证考察。这种研究策略上的转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理论后果，当他细致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家的实际工作时发现，那些被哲学家视为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准则，在真实的研究实践中往往难觅踪迹。牛顿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与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尽管都在从事科学，工作方式却判然有别。“范式”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困惑。在库恩那里，范式并非单纯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共享的整套工作框架，包括基本定律、本体论承诺、范例性的问题解答以及方法论指引。它的功能是双重的，既为研究者划定问题域的边界，又为他们提供处理问题的基本图式。更关键的是，范式不是从逻辑推演中得来，而是在共同体的训练与实践中的习得。年轻研究者通过学习经典范例逐渐内化一套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套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会的，通常作为背景性的预设运作，不进入研究者的自觉反思[2]。按照传统观点，科学之所以客观，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立于主观偏好的评判标准来裁决理论优劣。库恩的分析却表明，这套标准本身就内嵌于范式之中。常规科学时期，标准是稳定的，然而当反常现象不断涌现、现有范式的解释能力捉襟见肘时，危机便会出现，科学革命随之而来。新旧范式之间的竞争无法诉诸某种中立的更高标准来裁决，因为标准本身就是争议的一部分。科学史上那些被后人视为错误的理论，在其自身的范式框架内完全可能是合理的。反过来，今天被视为确凿的知识，在范式转换之后同样可能被抛弃。库恩真正挑战的并非客观性本身，而是那种将科学理性建立在一套超历史、去情境的评价标准之上的客观性观念。经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谓理性与客观性，并不是先验地保证科学正确性的外在尺度，而是依托于特定范式，在具体科学实践中得以运作的结果。任何客观性的实现都以特定认知框架为前提，而这个框架不是先验预设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

至此，科学哲学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在实证主义这一端，客观性被系于超越性标准，但这个标准自身的历史性已被暴露，它所许诺的那种绝对中立已难以为继。而库恩这一端，历史性与社会性被承认了，标准的情境依赖被揭示了，可一旦标准不再具有跨范式的效力，不同知识主张之间如何比较、如何判断就成了悬案。建构社会取向则认为，如果一切知识都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批判本身的立足点又在何处？超越性标准与彻底相对化，看似方向相反，却共享一个盲点，即两者都未能正面处理认知者的具体处境在知识生产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前者将处境视为必须被清除的噪音，后者将处境泛化为

无可裁决的差异。恰恰是在这个位置上，哈拉维的问题获得了紧迫性。既然超越性的担保已不可得，又不愿滑入无标准的虚无，那么能否从认知者的有限处境本身出发，为客观性重新找到根基？

3. 有限性何以成为条件

传统科学观的麻烦，归根结底出在一个隐含的等式上，即客观性等于无限制的视野。谁看得越全、越不受干扰，谁就离真理越近。哈拉维要拆掉的正是这个等式。在她的理论中，有限性并非客观性的残缺态，而是其成立的前提。这一翻转构成了情境化知识论最具认识论锋芒的部分。要理解它如何运作，需要沿着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依次展开，部分性何以优于整体性，客体为何不能沉默，以及客观性为何归根到底是一个责任问题。

3.1. 局部视角的优先性

正如哈拉维明确指出，认知主体“是片面的，是永无完结的”，“总是被不完美地建构和缝合在一起”[3]。这一判断包含双重否定，既否定主体的先验完备性，不存在一个先于具体认识活动的自足认知者，也否定主体的完成性，主体始终处于生成与变化之中，永远不会抵达某个终极的固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完成性在哈拉维这里并非缺陷，而恰恰是认识得以展开的条件。正因为主体不是封闭的自我系统，它能够向世界敞开，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不断重塑自身的理解。

这里潜藏着一个对传统认识论相当致命的推论。传统观念把理想的科学认识者设想为一个超越具体情境的理性主体，仿佛只要剥离性别、阶级、文化背景等因素，就能以纯粹理性的姿态面对世界。但哈拉维戳破了这层幻象，认为这种未受标记的主体并不是普遍可能的立场，它实际上只属于占据支配地位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处在既有制度结构的主导位置，其特殊位置才得以被隐藏，视角才会被误认为无视角。当特定社会群体的经验被当作默认标准时，这个立场本身就不再被当作一种立场来看待了，而是被包装成了一种好像谁都可以站上的观察点。相反，女性、少数族群、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的经验，反倒被认为带有偏见、不够规范，甚至需要被纠正。由此，局部视角的优先性获得了一种尖锐的认识论含义。哈拉维认为，身份并不产生科学，而批判性定位则产生科学。只有当认知者承认自身视角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观看是从某个特定位置出发的，她才能保持对自身认识结果的警觉，才不会将特殊结论普遍化。自我同一的主体由于否认自身的位置性，反而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其所宣称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独断。

不过，边缘位置的认识论优势并不等同于身份特权，哈拉维对此保持清醒的警惕。边缘位置者之所以更可能看到主流视角遮蔽的东西，不是因为苦难本身赋予了洞察力，而是因为他们持续被标记、持续被提醒自己并不处于那个免于质疑的默认位置[4]。一旦把这种处境凝固为新的认识论特权，批判性就会消失，边缘立场也就蜕变为另一种中心。决定认识论价值的并不是我是谁，而是我从哪里看、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是否愿意为此承担后果。

3.2. 客体不再沉默：认识对象的能动性

不要局部视角只解决了主体这一端的问题。如果客体仍然被当作等待主体开掘的沉默材料，那么知识生产的单向结构就不会真正改变。哈拉维要质疑的，正是传统认识论中这种几乎不被反思的默认设置，即主体负责观察、分析和命名，客体负责被呈现、被解释、被利用。只要这一结构被当成理所当然，知识就很容易滑向一种占有式的发现叙事，好像世界只是等着被揭开的东西，科学家站在足够中立的位置上把事实搬运出来就够了。哈拉维提出的修正是把知识对象重新理解为行动者，对象并不只是被动承受解释的东西，它会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后果，会对研究路径施加约束，会通过抵抗、偏转、意外结果让研究

者的预设不再顺畅。世界确实不会替自己发言，但它也不会任由研究者随意发言，会用自己的方式让某些解释站不住脚，让某些分类无法维持，从而迫使知识生产不断回到现场，重新调整问题、方法与叙述。

这一主张回到具体科学实践中并不抽象。以灵长类研究为例，动物并不是静止的自然背景，它们的行为模式、生存策略以及对环境变化的应对，会直接影响研究者能观察到什么、无法观察到什么，并迫使研究者调整视角、修正假设，甚至重做分类与编码。对象在这里并不是被动材料，而是在持续塑造研究的走向[5]。同样，在当代生物学对身体与性别的叙述中，雌性生物体越来越不再被刻画为消极的存在，而是在基因表达、觅食策略、繁殖行为等多个层面呈现出主动性与策略性。哈拉维借这些例子要说明的并不是新叙事更正确，而是知识之所以会改变，正是因为对象从来不是被动解释的材料，它始终在具体处境中以各种方式对我们的理论与叙述形成限制。

这种来自对象层面的约束并不限于生命科学领域，在许多自然科学实践中同样清晰可见。在实验物理学研究中，观测结果往往受到探测器灵敏度、信号分辨率以及实验装置结构的严格限制。研究者能够获得何种数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仪器如何筛选与转译物理信号，这些物质条件在事实上限定了理论解释的可能范围。同样，在地质学研究中，岩层结构、沉积序列以及断裂形态等地质材料常常以一种抵抗性的方式限制解释模型。当实地观测结果与既有理论不相符合时，研究者必须调整原有假设以回应材料本身呈现出的结构特征。由此可见，研究对象通过其物质属性持续对认识活动施加约束，这种来自对象层面的限制正是科学知识得以避免任意性的关键条件。

3.3. 客观性作为一种责任结构

有限的主体与能动的客体，这两项修正汇聚到一处，指向的正是客观性概念本身的重铸。在哈拉维的理论框架中，客观性不再意味着主体的消失，而意味着主体对自身位置的承担。

传统科学认识论所设想的客观性，建立在一种虚构的超越视角之上。认知主体被假定能够从脱离具体历史、社会与身体条件的位置观察世界，从而获得全面而中立的认识。这种看似普遍的视角并非真正地超越了立场，而是通过抹除自身位置的方式，将特定主体的经验自然化为无标记的标准视角。哈拉维拒绝这种宣称能看见一切却拒绝承认自身位置的姿态，同时也拒绝将相对主义视为替代方案，当所有知识主张都被视为同等有效时，判断与标准一并消解，这同样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哈拉维认为，相对主义与整体化是一对镜像，两者诉诸一种超越处境的全知视角。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另一个方向上。在这一框架下，有限性不再被理解为亟待克服的缺陷，相反，它构成了任何负责任的知识生产都无法回避的前提条件。只有当认知主体承认其视角的局限性，并对其所生产的知识及其后果负责时，知识主张才可能进入跨位置的对话之中。由此，情境化知识将客观性从一种“无处的观看”转向可被追问的定位。在哈拉维看来，只有部分的视角才能承诺客观性。

至此可以看到，一条由部分性出发，经由可修正性，最终指向可负责性的论证链条逐渐清晰起来。主体的有限性使其不得不承认观看的位置性，客体的能动性使知识主张必须接受来自世界的持续检验，而客观性则从一种自我宣告的中立状态，转化为一种在公开条件、承担后果、接受质询的过程中被逐步达成的实践成就。这才是哈拉维所说的“更强意义上的客观性”，它的力量不来自视角的隐匿，而来自条件的暴露。

4. 三重机制：负责任的客观性如何运作

若要将有限性作为客观性的条件之一翻转落到实处，还需要回答一个更具操作性的问题：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有限性通过什么样的认识论装置被转化为可靠性？哈拉维并未给出一套体系分明的方法论原则，但从她的文本中可以辨认出三个彼此勾连的机制。

4.1. 视角

哈拉维之所以反复借助“视线”(vision)这一隐喻来讨论科学客观性,并非出于对视觉经验本身的偏好,而是因为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看见长期被当作认识的基本模式。人们习惯于把知识理解为一种观看行为,看得越清楚、越全面,就越接近真实。这种理解在科学语境中几乎不需要辩护,却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对客观性的想象。当代技术条件非但没有削弱这一幻象,反而给它注入了新的说服力。哈拉维写道:“在这种技术盛宴中,视觉变得毫无节制;所有角度都让步于无限灵活的视觉,它不再只是神秘地与上帝从不知何处看到一切的伎俩有关,而是把神话放入了普通行为中。”^[3]各类成像技术将人的观看能力延展至以往不可见的层面,技术因此被理解为感官的自然延伸,而不是需要被反思的认识条件本身。

哈拉维要拆解的正是这种不被追问的透明感。经由技术呈现出来的,并非对现实的直接再现,而是在特定技术、理论和实践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结果。仪器如何筛选信号、如何将数据转译为可视形式、如何将复杂过程简化为可读图像,这些环节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参与着对象的建构。观看从来不是发生在一个抽象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始终嵌入在复杂的中介结构之中。当这些中介条件被隐藏起来时,观看就会被误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认识活动本身便免于反思。

视角在这里承担的功能,是结构性的限定。它划定了认识活动的边界条件,感官条件、学科训练以及既往经验,都会影响研究者在观察中如何取舍材料、建立关联,并最终形成判断。需要说明的是,哈拉维在此所讨论的身体,已超出生理学的界定,它既包含自然过程的成分,也受到文化塑造的影响,物质维度与符号维度在其中难以截然划开。每一个从事认知活动的主体都处于某个具体的社会位置之中,携带着特定的身份背景、制度角色以及或隐或显的利益关联。这些因素并非外在于认识活动,而是渗透在认识过程的内部,参与着对象被理解与意义被赋予的方式。视角机制的要义在于,把这些通常退居幕后的条件拉到前台不是为了宣布认识不可靠,而是为了让认识的可靠性建立在可检查的基础之上。

从这一角度看,多元局部视角并不意味着彼此孤立的知识碎片,而是在持续比较与修正之中形成一种开放的认知对话机制。不同研究路径往往依赖不同的理论假设、技术装置与观察方法展开,这些差异化视角在交叉检验中能够揭示各自解释框架的局限。当来自不同研究位置的观察结果在独立条件下指向相似结论时,知识主张的可靠性便在这种交叉验证中逐渐增强。由此,客观性不再被理解为单一视角所提供的绝对真理,而是在多重有限视角之间通过持续对话、批评与修正逐步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成果。

4.2. 定位

如果说视角已经揭示出认识活动总是从某个具体位置出发,那么“定位”的提出,则是进一步要求这一出发点被明确说出来。在哈拉维的用法中,“定位”(position)不是一种礼貌性的自我声明,不是研究者在论文开头先交代一下自己的身份就算完事。很多时候这种表态不过是仪式,说完之后照旧按传统路子写下去,仿佛只要承认有立场,就已经完成了对客观性的反思。哈拉维要的远不止于此。

在许多科学叙事里,观察者被设想为能够从自身处境中抽离出来的理性主体,以一种不受位置与中介条件影响的“无处之眼”(view from nowhere)自居。主体所依赖的身体、技术中介与社会条件退居幕后,知识看似纯粹中立,却在结构上免于被追问。客观性由此容易退化为一种逃避责任的幻象。定位所要恢复的,正是这种被取消了的可追溯性。主体不可能从自身的身体、训练和经验结构中抽离,即便在最抽象的理论工作中,社会位置所携带的利益取向也始终在场。只有当位置被承认并被呈现,知识才可能成为可反思、可修正的产物,而不是被包装为无需解释的自然事实。

但位置的含义并不止于社会身份或政治立场。它还涉及知识生产得以展开的具体技术与实践结构，我们如何看见，往往取决于我们借助什么装置、采用什么方法、依赖什么编码与表述方式。这些环节并非中性的中介，恰恰相反，它们在具体操作中预先划定了可见性的边界，同时将其他可能性排除在外。因此，定位要追溯的不仅是谁在说，还包括凭什么说，以及通过什么装置在说。由此而来的，是一种负责的科学理念。所谓负责，并不是用价值中立来为知识背书，而是要求研究者将自身的位置、方法与中介条件纳入论证，使知识能够被追问和修正。哈拉维明确提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无害的客观性学说，而是一种有用的客观性学说。这里的有用，就是能够切实回应知识生产的责任问题[6]。

4.3. 衍射

视角限定了认识的边界，定位使这些边界可被追溯，但二者加在一起仍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当不同的局部视角被并置在一起时，它们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发生关系？如果只是各自表达、互不干涉，那就滑向了相对主义。如果试图加总为一个全景，则又退回到上帝之眼。哈拉维引入“衍射”(diffraction)，正是为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打开第三条通道。

在传统科学观念中，反射构成了知识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隐喻。知识如同镜面，功能在于忠实复制被照之物，评判标准落在像不像、准不准这类对应性问题上。反身性地提出原本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要求观察者将自身也纳入描述范围，承认社会学家对科学的解释同样是建构的产物。但这种策略虽然避开了透明主体的假象，却仍未跳出镜像的框架。越是强调把自己照清楚，越容易陷入无穷递归。反身性固然揭露了镜子并不透明，却未必真正动摇以镜像式再现作为目标的前提。

衍射的隐喻来自物理学，是指波穿过狭缝或绕过障碍后发生扩散，并与其他波相互叠加，在另一侧形成强弱交替的图样。它呈现的不是对象的镜像复制，而是波在特定条件下留下的过程性痕迹。如果说反射像照镜子，关注的是像不像，那么衍射则像波穿过缝隙形成图样，关心的是差异如何出现。将这一隐喻引入方法论后，讨论的重心随之转移，不再执着于表征是否足够准确，而是追问差异在何种实践条件下被生产出来[7]。

在衍射的视角下，文本不再被理解为镜子，而更像一块记录屏，它留下的是知识实践如何发生的痕迹。哪些环节决定了可见性，哪些选择稳定了对象的边界，哪些叙述方式把某种解释固定为更自然、更可信的事实，这些才是衍射式阅读要追踪的对象。装置与概念不只是被动工具，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分配可见与不可见，写作也不只是事后包装，它同样参与了差异的组织与固化。客观性在这里不是看一个文本是否忠实复制了一个现成的实在，而是看研究过程是否经得起追问，当别人提出质疑、反例或更换条件时，结论是否允许被修正。研究者要做的，不只是给出结论，还要把关键步骤交代清楚，让他人能够追踪、检查并提出批评。

视角首先划定了认识得以展开的结构边界，使从何处看本身进入知识主张的内部。进一步说，定位要求这些边界被明确呈现，从而使相关论断具有可追溯性。至于衍射，它提供的不是简单调和差异的工具，而是一种在具体实践中处理差异生成的方式，使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不再停留于加总或对抗。三者合在一起，所指向的并非一种更宏大的观看位置，而是一种更经得起持续追问的知识生产形态，这也正是哈拉维所谓负责任的客观性的运作逻辑。

5. 问题与意义

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论自提出以来，相对主义的指控从未真正平息。哈丁就曾直言批评这一理论在认识论层面滑向了相对主义。当认知主体被描述为片面的、永无完结的，当一切视角都被宣告为局部的且被建构的，区分可靠知识与任意说辞的依据似乎也就随之消散了。

但这一指控恰恰误置了哈拉维的用力方向。她说得很清楚，相对主义与整体化是一对镜像，都在回避对自身位置的说明与承担。哈拉维的方案不是在两极之间找折中，而是换了提问方式，客观性的保障不在于视角的消除，而在于视角的公开以及由此开启的可追问性。知识主张一旦把自身的位置、装置与方法条件交代清楚，就进入了一个可以被检验、被反驳、被修正的公共空间。客观性由此从静态属性转化为过程性的实践成就。

这一重构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具有推进意义。其一，它改变了客观性概念的着力点。方法的可靠性不来自把情境剔除出去，而来自把情境讲清楚并承担其后果。技术与制度不再是外在附属物，而是参与知识形成的内部条件，把它们纳入论证非但不削弱可信度，反而使知识主张获得了可检查的基础。其二，它为相关科学批判开辟了一条既拒绝整体化真理、又不滑入认知虚无的路径。任何视角都必须交代其生成条件并接受质询，不存在可以永久免于检验的观察位置，差异因此被保留为认识资源而非被压缩为统一尺度的附属变量。

承认这些贡献之后，困难仍然需要被正视。情境是这套理论的支点，却也是它最容易松动的地方。性别、阶级、种族等维度常常交缠在一起，当它们指向不同的判断方向时，研究者该依据什么准则裁量，哈拉维并没有给出足够明确的操作指引。多元视角的结盟同样悬而未决，各个局部视角依据什么机制走向对话？分歧难以调和时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实践层面的关键环节，在她的论述中更多停留在蓝图勾勒的层面。哈拉维后来试图用一种更好的实在论来回应，但始终没有将其展开为系统的理论。这既是一种未竟，也说明了问题本身的顽固，在承认有限性之后如何重建判断标准，并不因为被提出就自动获得解答。

不过，理论的未竟未必等同于失败。客观性从来不是主体隐身后的自然显现，而是在公开检验和问责中逐步确立的。情境化知识论所开辟的，与其说是一条通往确定性的道路，不如说是一种在不确定中仍然承担责任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洪谦. 维也纳学派哲学[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22: 58-59.
- [2] [美]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张卜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94-97.
- [3] [美]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409-410+401.
- [4] 洪晓楠, 郭丽丽. 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观解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2): 95-100.
- [5] [美]唐娜·哈拉维.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M]. 赵文,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13.
- [6] 周丽昀. 情境化知识——唐娜·哈拉维眼中的“客观性”解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 21(11): 20-24.
- [7] 杨艳. 从反身性到衍射: 回到生活世界——唐娜·哈拉维历史生成论的科学观[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25(8): 23-28.